

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

# 唐宋散文 X 导 读

tangsongsanwen  
daodu

主 编 熊礼汇 闵泽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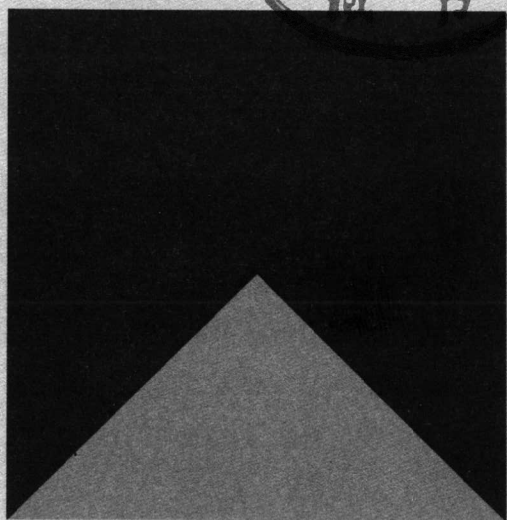
长江文艺出版社

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

# 唐宋散文导读

TANGSONGSAWENDAODU

主 编 熊礼汇 闵泽平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散文导读/熊礼汇 闵泽平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7

(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

ISBN 7-5354-3068-6

I.唐…

II.①熊… ②闵…

III.①古典散文-文学欣赏-中国-唐代-高等学校-教材

②古典散文-文学欣赏-中国-宋代-高等学校-教材

IV.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3781 号

责任编辑:黄义和

责任校对:梁 风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吴竹敏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mailto: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明伦印刷厂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8.87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6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

定价:28.9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龙泉明 周百义

副主任: 赵世举 李正武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国恩 陈文新 李中华 卢烈红 王兆鹏

萧国政 熊礼汇 於可训 张箭飞

总主编: 龙泉明

---

#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这已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思考应对的当务之急。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社会各方面都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础，抓好本科教学是提高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重点和关键。当前，必须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质量建设，把加强本科教学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已在广泛酝酿。

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自 2002 年起，便对本科教学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我们感到，过去全国高校中文专业教学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一些共性问题：从课程构成看，通论性、概述性、通史性课程多，原典性课程少；从教学模式看，往往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以课堂讲授为重点，学生被动听得多，主动读得少，积极思考和自觉动笔更少。这便导致学生养成了对教师的过分依赖和对教材的一味拘泥。因而，学生阅读量小，写说能力弱，理论知识较空泛，专业基础欠扎实，更缺乏勤于思索的习惯、勇于质疑的意识、大胆批判和积极创新的精神。这似乎已是全国高校中文系同仁的共识。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便从调整课程体系入手，压缩通论性、概述性课程，增加原典性、实践性课程；减少教师讲授时间，提高学生自己阅读和思考的比重。努力构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全面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师生有机互动的新型教学模式。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开设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并把部分纳入必修课之中），促使学生扎扎实实地读原典。通过读原典，来打牢专业基础，锻炼自我钻研能力，培养扎实学风，熏陶思想品格，提高综合素质。

这套《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共10种）正是为了满足这场新的教学改革需要编写的。试图为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包括社会青年）提供一套内容广泛、体系完整、选择精良、组合科学的语言文学经典著作读本，并对这些著作的阅读理解提供一些必要的引导。与一般的鉴赏性、导读性选本不同的是，我们的主旨是为学生提供原汁原味的原典精选。因而，我们的功夫主要在于“选”。力图尽我们所能选出真正能够反映学科轮廓、代表学科精粹的精品来。至于“导读”，主要是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和有助于阅读理解的相关材料，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意见，尽量多给一些启发，少给一点成说。其目的是把空间留给学生，让学生自己研读，自己咀嚼，自己品味，自己感悟，从而获得能力的锻炼、知识的积累、感情的熏陶和思想的升华。因此，本丛书的编写原则是：突出原著，扼要导读，体现特色，适宜教学。

为了保证编写质量，我们特约请本专业各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知名教授担任各书主编，组建了编辑出版委员会，大家就编写问题进行了多次认真的研讨，希望呈献给大家的是满意的作品。不过，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缺点甚至错误可能在所难免。我们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帮助我们不断完善这套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本书的编写出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谨表谢忱！

龙泉明

2003年9月

## 唐宋散文导论

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源远流长。在古代所有文体中，论创作历史之悠久，只有诗歌可以与之媲美。古典散文发展到唐宋时期，已经经历了几个高峰期，唐宋散文是古典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峰期的产物。它在继承先秦两汉散文艺术传统和吸收六朝骈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具文学个性和美学意蕴的文体特征。其中，唐宋古文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它所具有的艺术精神和特有的识度之美、事义之美、情慷之美、风神之美、色泽之美，对增强古典散文的文学性和丰富其艺术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古文在内的唐宋散文，对古典散文的走向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要说明清散文的发展深受唐宋散文的影响，就是在白话文兴起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唐宋散文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它的艺术传统、语言表现艺术，仍对散文写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

中国散文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先唐和唐以后两个阶段。先唐时期，是古代散文产生和发展的时期。《尚书》为上古官府文书的总汇，已具备朦胧的文体意识，显示出向独行之文演进的趋势，可谓最古的散文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巨变，学术思想空前活跃，散文也随之全面兴盛。历史散文，由《春秋》的逐年记述人事，发展到《左传》、《国语》以诸侯活动为中心纪事，最后发展到《战国策》以士的言行为中心内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说理散文，由《论语》的语录体、《孟子》的对话体，演变为《荀子》、

《韩非子》的专论体，《墨子》、《庄子》则处于由语录体向专论体的过渡阶段。论其艺术风貌，则《尚书》浑浑噩噩，《春秋》谨严深微，《左传》从容委曲，《国语》深厚浑朴，《战国策》铺张扬厉，《老子》简约深刻，《论语》雍容平和，《墨子》质实严密，《孟子》雄健激越，《庄子》恣肆奇诡，《韩非子》峻峭排戾，《荀子》平实谨严，《吕氏春秋》浑厚平易，分别为儒、墨、道、法、纵横诸家散文艺术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两汉散文艺术的嬗变，主要是论辩艺术的嬗变。这一嬗变历程，进一步强化了古典散文以理为主的审美特征。汉初之文，秉承先秦余绪而自出变化，单篇散文大多雄丽刚劲、逸气纵横，无论是贾谊、晁错的疏直急切，还是枚乘、邹阳的任气陈说，都不无战国余风。著述之文蓬勃兴盛，虽内容各异，风格不同，却都呈现出宏博雄奇的特色。《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荟萃诸子，旁搜异闻，既是对先秦思想的集结，也是对先秦文化知识和艺术经验的综合吸纳；《史记》尽取前代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秦汉时文以及《诗》、《骚》等书之长，剪缀融合，扬榷变化，将散文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但两汉新儒家散文的发展与成熟，是在宣帝到桓帝时期。刘熙载说：“秦文雄奇，汉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谈，汉不如秦；本经立义，秦亦不能如汉也。”他又说：“贾长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若董江都、刘中垒，乃汉文本色。”（《艺概·文概》）所谓“汉文本色”，便指行文多依经敷旨，本经立义，条分缕析，婉曲作论，语言典雅弘奥，其代表性作家为董仲舒、匡衡、刘向、谷永、贡禹、梅福、王嘉等。彼等为文喜广征博引，好言天象灾异，多罗列归类，少仗气直言、快意为文，文风驯雅温润，厚重舒缓。桓帝以后，国势隳颓，“婞直之风”盛行，士人多自逞己说，抽心作论，无意于引经佐证，直是脱口而出，言所欲言，心口如一，体现出清峻通脱的审美特色。建安散文，或由通脱走向清峻，或由通脱走向华靡。曹操务实尚用，深忌浮华，用语简约质朴，不避浅俗，多奇句单行。同为逞性作论，以气运词，孔融、祢衡等则代表着文辞典丽、句尚偶俪的前进方向。曹氏兄弟，雅好慷慨，喜富赡华美之辞；陈琳、阮瑀等人之作不乏浮

辞泛藻，有翩翩之美。彼等为文务求清妙华美、光泽炳焕，句式讲求整齐，语词追求佳丽，用事不厌其多，文辞不厌其繁，纂采、华靡成为一时风尚，东汉散文也完成了由质到华的转变。

魏晋思想新变，散文如影随形，自成特色。儒家之文，立论平实，说理透彻，文辞壮丽，句式整齐。玄学家之文，受清谈方式、技巧影响所致，师心独见，刻意求新，文辞简质，锋颖精密。阮籍与嵇康生活在禅代之际，颇多愤世之辞。同为著名玄学家，阮籍受道家影响甚深，惯于铺陈，文多偶语对句，气盛辞壮；嵇康受名、法家艺术传统影响，长于辨难，析理绵密，如剥茧抽丝，无不尽意而后止。潘岳、陆机继承汉代新儒家散文艺术传统，均以才赡词丽著称。潘岳富于情，多抒怀之作，以诗为文，虑赡辞变，易入新切；陆机饶于气，多说理文字，以赋作论，引书助文，思能入巧。东晋名士，玄礼双修，故集两种文风于一身：王羲之为文，或抽思约言以示其逸韵高致，或尽怀极言以明其远见卓识；陶渊明之文，高标卓立，重在写意，若不经意，信口而出，朴淡淡净，或不违名教而平实和缓，或委运顺化而萧散闲远。

南朝骈文创作极度繁荣。先秦时期，散文中的偶句与排比句时常出现。西汉以来，以赋作文蔚然成风，通篇排偶的文章已经出现。东汉以迄魏晋，尚整齐、求华丽、好铺陈成为文章创作的演进趋势。齐、梁时期，骈文体制臻于完美，论政议事、抒情写志、描景绘物，无所不能，取青妃白，移官换羽，骈四俪六，几乎取散文而代之。谢灵运、鲍照、颜延之等无文不骈，庾信、徐陵更使骈文的对称、和谐、声韵、典雅、色泽之美无以复加。骈俪化的趋势与华靡的风尚，使散文早期的审美特征日益削弱，文体功能也被逐渐剥夺，其创作呈现衰颓之势。西魏宇文泰、苏绰及隋代的李谔等人，力革浮华，提倡散文，试图将文学重新纳入儒学范畴，但他们以文学性的丧失为代价，只知复古，不思创新，所以即使用行政手段也不能带来文风的改变。散文的全面复兴，到唐宋时期才真正实现。

唐宋散文之变，从欧阳修以来，都认为始于中唐元和年间。不过，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早就指出：“唐有天下二百载，而

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这也就是说，韩、柳之前，唐文已有三变。

唐承隋制，初唐文风亦如其旧。崇尚富藻，争构纤微，竞为道丽，雕刻成习。因此，即使唐太宗对华靡文风的危害有所认识，也“不能革五代之余习”。但唐太宗和魏征等人的文章，虽用骈体，却内容质实，少浮辞赘典。尤其是魏征之文，率多激切，词强理直，气势雄峻，造句整齐中富于变化，或穿插单行散句，或以隔句相对，或以散句排比，使骈文更趋于实用。王绩先仕后隐，为初唐特立独行之士。其文不乏音韵流畅、词藻华丽之作，别具一格的却是自叙生涯、自抒襟怀、奇趣横生的散文，如《醉乡记》、《无心子传》等。这些散文尽管有明显的模拟痕迹，但显示出了散文抒情写志的趋向。真是“（其）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高宗、武后时期，王勃等初唐四杰，开始自觉地批判宫廷文学中的齐梁遗风，力图以宏伟壮丽来廓清雕刻细琐之弊，使骈文由绮碎走向宏博，以适应蒸蒸日上的时代特点。故四杰之文，词藻更为富赡，语言更为秾艳，不无变本加厉、踵事增华之嫌，却始终洋溢着清新俊逸之气，透露出青年作者骄人的才华与非凡的自负。其文纵横恣肆，挥洒自如，英思壮采，如泉之涌。王勃《滕王阁序》的珠玑络绎、典丽精工，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的淋漓慷慨、声光奕奕，卢照邻《五悲》、《释疾文》的凄惻深沉，杨炯《王勃集序》的神采飞扬、顾盼生辉等，都与陈、隋绮章绘句之文不可同日而语。只是其流弊所至，多有虚夸、冗长之势。武后爱好辞章，词臣力求绮错婉媚，无论李峤、崔融，还是苏味道、宋之问，乃至阎朝隐，都能歌善颂，曲申悦媚之情，所以张说对他们的文字极为鄙视，认为“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刘肃《大唐新语·文章》）。真正能以风雅去浮侈，开始给散文复兴带来契机的，是陈子昂等人。一方面，陈子昂之文大多有为而发，重在实用，言事说理，力求清晰缜密，如《谏灵驾入京书》、《驳复仇议》、《谏雅州讨生羌书》等，无不直言极谏、博瞻周

密；另一方面，陈子昂追求疏朴质直的风格，在形式上注意化骈为散，多用散句，偶有对句也务求流利畅达。陈子昂的文章，和他的诗作一样，或许存在着质胜于文的缺陷，但对唐代文体革新产生了深远影响。此间，以经典为本而自成一体的，还有“富吴体”。富嘉谟、吴少微均擅碑颂文字，风格雅厚雄迈。

开元年间，文风又有新变。所谓新变，源于儒学的复兴而表现为文章的日趋散化。《新唐书·文艺传》说：“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崇儒兴学，延揽文士，盛世气象显露无遗。一时重臣，虽以政事著称，却多以文辞为进身之资，精通儒义与擅长辞章为他们共同的特征。为粉饰盛世，骈文的典丽宏赡被发挥到极至；而儒学的浸染，又加重了文章的思想含量，削弱了骈文形式的严格限制，使文风趋向清华雅丽。张说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他“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郾都引》），朝廷文书，多出其手，与苏頲并称“燕许大手笔”。良好的艺术修养与高远的志向，使张说既能以气驭词，自抒胸臆，又能兼徐、庾之所长，出语秀丽，隶事精切。他顺应潮流，对骈体大胆改革，运散体之势于骈体之中。其文句式整齐而不限于四六，句式整齐，则文章连绵有气势；间杂散句，则文气疏宕。张说的碑传墓志，或渊懿朴茂，或平易通畅，或宏赡典雅，或意趣盎然，注重事迹的叙说、情节的渲染和人物形象的烘托，其精彩之处往往在于用散笔所作的场面勾勒与细节描写，对韩愈、柳宗元等人碑传文的创作，颇有启发。他的少量散体文，更显示文章散化的倾向。文章由骈复散的倾向，不仅表现在张说、张九龄等朝廷要臣的文章中，还体现在盛唐诗人的文章写作中。李白之诗雄奇奔放，行文亦好作大声壮语，一气贯注，畅所欲言，自我形象突出，主观色彩浓厚。因此，无论是书、表还是其它文章，多是简捷直致，开门见山地表达出自己的要求与希望。同时为了使自己的主张为人接受。李白作文常极力烘托，反复渲染，必将文意写透说尽而后止，故其文往往突破骈体的种种束缚，多铺陈之言，夸饰之语，内容不免单薄，而文气自是不弱。杜甫之诗有沉郁顿挫之美，行文亦抑扬百转，婉曲迂回，欲言又

止，意蕴深沉。他的文章，常是一言数转，一意数回，多纤徐之态，少酣畅之容，文断意随，极尽顿挫之美。不过，对古拙的过分追求，使他的文章不能做到文从字顺，流丽畅达。王维善于将意境的营造、情绪的渲染、景物的勾勒极为和谐地融为一体，从而创作出了《山中与裴迪秀才书》那样富有诗情画意的散文名篇。

天宝以降，古文家在文坛渐露峥嵘。复古的思想一旦滥觞，便汇集成不可阻遏之势。这批古文家大多以儒家思想为依归，激烈抨击华靡柔弱之习，倡导文体复古，以其文体革新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他们主张用散文“尊经”、“载道”，认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将提倡古文和振兴国势结合起来，试图以对三代两汉之文的效法来取代六朝以来的俚偶章句。为此，他们强调行文当取法魏晋以前的古文。萧颖士自谓“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还，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独孤及自言其文“大抵以五经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书”（《赵郡李公中集序》）；贾至“为玄宗巡蜀分命之诏，历历如西汉文”（李舟《独孤常州集序》）。复古思潮的盛行，使散文得到了迅速发展。萧颖士所存作品，多为骈体，但已开始突破骈体程式，如《与崔中书圆书》之类，即以散体为主，杂以偶对。李华兼擅各体，碑铭、论赞、序记等都有佳作。其文体风貌，亦与后世古文相仿佛。其《含元殿赋》，洋洋三千余言，不事华靡，文字畅达，与刻意铺排、堆砌典故之作迥异；《与表弟卢复书》等一组家书，叙说家常，倾诉肺腑之言，亲切朴素；《吊古战场文》更是广为传诵的名篇，作者以赋为文，段段用韵，将战场之苦、阵亡之惨写得惊心动魄。感慨悲凉之中，自饶风韵。贾至多制诰册文，如“高冠华簪，曳裾鸣玉”，典雅华赡；其议论之文如《议杨绾条奏贡举疏》等，则复雕为朴，质实平易。独孤及为人宽畅博厚，长于议论，用意重在立法诫世，褒贤贬恶，不徒以词采取胜，“质取其深，艳从其损”，所作《仙掌铭》、《古函谷关铭》、《琅琊溪述》、《送李白之曹南序》等，或格高理精，或新颖奇诡。在这批古文家中，元结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元结忧

世、愤世之情甚浓，救世、劝俗之心极切，有意复兴儒道，挽救世道、人心，故其文危苦激切，多狂狷之言。尤其是他那些短小精悍的杂文，如《丐论》、《时规》、《世化》等笔锋犀利，绘形图象，逼真生动，发人警醒。元结雅好山水，其山水亭阁记也非常出色，多即景寓意，由日常生活或眼前景致引发开去，富有理趣而深有寄托。文字幽眇芳洁，自成境趣。如《右溪记》写作者由溪之不遇，引发的“怅然”之感，实为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之先导。元结的其他文字如论序、表状、碑颂之类，意气超拔，峻伟雄刚，最能体现其刻意求古之心。如《大唐中兴颂》寓讥于颂，行文即仿照秦代石刻三句一韵的手法，显得文辞奇崛古朴，典重厚实。可以说，元结是在韩、柳之前古文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故欧阳修称其为“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的“特立之士”（《集古录·唐元次山铭跋尾》）。

## 二

从初唐到中唐前期，散文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不过，相对于诗歌等其他文体，散文革新的进程却显得曲折而缓慢。一方面，骈文流行文坛达五百年之久，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表达形式，为文人充分熟识和接受，在特定场合和某些传统文体中，更为实用；另一方面，前期的散文革新者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有的不能从骈文写作的固定模式中挣脱而出，有的则对骈文全盘否定。尤其是中唐前期的古文家，复古有余而创新不足，致使散文的文学性无法充分展示，不能有所树立以改变一代文风。韩愈、柳宗元正是在继承前代散文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当时政治形势、思想建设的需要，利用人们求新、求变、尚实、尚俗的审美心态，通过复兴儒学、复兴三代两汉之文来推动散文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改革，使得唐代散文以全新的艺术风貌出现在散文史上。

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衰落。贞元、元和时期，号称“太平”和“中兴”，实则元气未曾恢复，而外患频起，内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国家经济衰退，民生凋敝，致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人们企盼革新，铲除弊政，恢复盛世。有识之士纷纷探求治世良方，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唐代的古文运动与其说是一场文体革新运动，毋宁说是一场思想文化的复古运动，它不仅希望通过复兴古文，建立一种自由流畅的散行文体，更希望借助复兴儒学，建立一套补阙救弊的哲学、政治理论，通过重建道德规范挽救社会危机，加强和巩固唐王朝大一统政权。为此，韩、柳强调学古文的出发点在于学古道，“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韩愈《答李秀才书》）；“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们所讲的“古道”，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为维护所传之道的正统性和纯洁性，韩愈大力攘斥佛、老，排除从两汉以来的种种杂说，把古文的创作直接和古圣贤之道的宣扬捆绑在一起，通过重新树立儒学权威，为古文创作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韩、柳还提出了一套合理的古文写作理论。他们重视作家的修养，提出了“气盛言宜”之说，认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翱书》）；同时又强调古文要表现作者的真切感受，提出“不平则鸣”；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韩愈还主张推陈出新，要求做到词必己出，“唯陈言之务去”。柳宗元对散文的功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散文应有的艺术风貌以及如何取法前人的创作经验等问题，都有精到的看法。他说“文有二道”，认为应该将应用之文与审美之文区分开来，用不同的标准加以规范。应用之文要求词正理备，审美之文则应意畅言美。这种对实用散文和文学散文的区分，为古文文学性的发展，提供了合理依据。而散文文学性的增强，正是韩、柳对唐代古文运动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

韩愈、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巨大贡献，还在于他们写出了许多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都极富创意的古文，为时人和后来者写作古文提供了典范。同时，他们还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写作古文的作品

家，使古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韩愈现存古文三百余篇，各种文体都有名篇佳作。除少数应酬文字（包括所谓“谀墓”之作）外，大都内容实在，情感真挚。或议论，或叙事，或抒情，无不各臻其妙。其论说文，如《原道》气势磅礴，纵横开合，雄辩有力；《杂说》等犀利精悍，淋漓顿挫，奇诡变幻。其记叙文，如《张中丞传后叙》等历落有致，神色毕现。其抒情文，如《祭十二郎文》情辞痛惻，字字血泪。韩愈为文，求新尚奇，但他对包括骈文在内的各种文体和前代作家的作品都能吸取它们的长处，真能做到“集八代之所成”又能有所创新。韩文笔力雄健，气势充沛，其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避畏，不敢迫视”（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他巧譬善喻，能把深奥抽象的道理说得形象生动而又透彻，叙事状物能穷形尽相。文中句式长短错落，伸缩自如而又一气贯注。同时他爱采用辞赋的铺叙和骈文中的排偶手法，使语句形成自然的音响节奏，表现出形式的美。韩愈使用语言，能熔古代书面语言和口语于一炉，然后加以提炼，因而韩文语言新鲜活泼，而又精炼明确，富有极强的表现力与概括力。总之，韩文“猖狂恣睢”，具有多种艺术特色，除了“文从字顺”、章妥句适以外，还有“怪怪奇奇”的一面。他的语言以平易顺畅为主，但也爱用僻字怪字，这些都对后代古文家产生过很大影响。

柳宗元众体兼擅，无论记山水、状人物、谈文章、论政事、述哲理，都能形容尽致，辨析入微，真所谓“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论说文雄辩滔滔，凌厉峭折，大小政论无不笔锋犀利，论证精确。他的传记文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有的学习《史记》、《汉书》中人物传记的表现手法，如《段太尉逸事状》；有的则是自有创造，如他的《宋清传》、《梓人传》明显地吸取了唐传奇的特点，但又不是纯传奇。他善于即事立意，平中见奇。柳宗元是第一个使寓言成为独立文学形式的作家。他的寓言继承诸子寓言的传统，借鉴六朝以来小说、杂文的写作技巧，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思想深刻、情节生动的文体。这些寓言多以人、禽兽、草木的小故事为题材，有的反映了作

者的政治见解，有的宣扬人生哲理，虽然篇幅颇为简短，但波澜起伏，尺幅之中有千里之势，寓意深远。山水游记是柳宗元对古代散文最出色的贡献，它们不但再现了南方自然山水的美，还写出了作者感情的微妙变化。作者以简洁传神的语言，清新俊爽的文笔，细致入微的描摹，创造出一幅幅自然山水的优美画卷。柳宗元在以优美笔触为山水绘形取神的同时，将自我融入其间，构成浑融统一的整体，传达出山水内在的韵律。这种借写被遗弃的山水以吐胸中之气的做法，把古代山水游记的写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柳宗元的优秀作品大都产生在被贬以后。长期的谪居生活，使柳宗元对社会弊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形同囚犯的忧患生活，使他悲愤填胸，抑郁难平。再加上他这时有意识地研究先秦两汉古文，因而能写出更为优秀的作品。柳宗元散文的基本风格是高古峭拔，新奇深刻，精致简洁，既“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又“言畅而意美”。韩愈评价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熙载言“柳文如奇峰异嶂”，都说明柳文具有“内”、“外”兼擅其美的特点。

古文运动的蓬勃开展，还得力于韩、柳同时代众多散文家的积极参与。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当时影响甚大。他们对古文发展的最大贡献，是将古文文体用到一向为骈体所垄断的制策、奏议之中。《旧唐书》元、白本传说：“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白居易的制策、奏议，多直言极谏，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其书札、记序，多言情述志，文笔简洁，旨趣隽永，如《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均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元稹曾“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其章表奏状，往往不假修饰，明白晓畅，对促成朝廷应用文字由骈而散、由雅丽而古朴起了很大作用。他与白居易的平易文风，对宋代众多散文家风格取向的影响不可低估。刘禹锡自视甚高，认为其文足以与韩、柳、李翱同列，纪昀等人也认为“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〇《刘宾客文集》）。不过，他所自负的议论文字如《天论》、《因论》等，虽析理透

辟，层次井然，但思想性大于文学性。吕温曾向梁肃学文章，根柢深厚，尤长于碑赞文字，《三受降城碑铭》等，时有奇逸之气，与韩、柳同类文章相比也毫不逊色。吴武陵才气壮健，其书序笔意高古，颇具纵横之气；题记之类，写景状物，穷形尽态，不失雄肆之风。欧阳詹之文，“新无所袭”，“言多周详”。李观不依傍前人，与韩愈以古文相砥砺，其文激昂超越，落落老成，但质胜其辞，或雕琢艰深，不能自达其意。

韩愈敢于抗颜为师，培养了一批古文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李翱和皇甫湜。“世称学于韩者，翱得其正，湜得其奇”（章学诚《皇甫持正文集序》）。李翱为韩愈侄婿，亦为韩门弟子。他论文重意、重言，认为“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强调“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答朱载言书》）。他的才气与学识虽都逊于韩愈，不能熔铸百氏为己所用，但立言有根柢，为文温厚和平，俯仰中度。苏洵即云：“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皇甫湜论文尚新尚奇，认为“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富则出众，出众则奇矣”。其《公是》、《悲汝南子丧》等，或意新，或词高，无不蹈正超常，颇异于流俗。但他着力铺排，往往反伤工巧，终无自然气象。沈亚之曾游韩愈之门，诗文兼攻。他颇有意于史志，故对人物传记多所用心，所作《李绅传》、《表医者郭常》等，较为出色，但也明显存在着刻意求工、务为险崛的倾向。把求奇倾向发展到极至以满足人们好奇之心的是樊宗师。樊宗师独追古作者为徒，不顾世俗轻重，词句刻深，为文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但务于怪僻晦涩，以至出语造句违反汉语常规，使人读之不能了了。欧阳修读其《绛守居园池记》，即谓“其怪奇如此”（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上）。

### 三

中唐以后，由于社会危机日深，儒学随之衰微，士人为人并不唯儒道是从，使得古文失去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加上有些作者在创作理